

“马革裹尸”:东汉名将马援的忠勇精神

刘瑜

马革裹尸是一则来源于历史故事的成语,有关典故最早出自于南朝·宋·范晔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。马援(前14年—49年),字文渊,扶风茂陵(今陕西兴平东北)人,乃东汉开国大将,封号伏波将军。马援胸怀“死于边野,马革裹尸”的磅礴之志,一生征战沙场、戎马倥偬。智取陇蜀,堆米为山;西平诸羌,安定百姓;南伐交趾,吏士见其皆诚服;北遏乌桓,敌军闻风纷逃散;最后歿于平叛五溪蛮的前线,终以马革裹尸还葬,无愧当年诺言。

历史无言,精神不朽。马援为天下统一、国泰民安而驰骋疆场的事功印刻于史册,其忠勇赤诚、谦逊有礼的高尚品行更流芳千古,后世无不以其大义为榜样、为其忠勇而赞叹、闻其生平而潸然。

胸怀大义,一片赤诚保江山

西汉末年,百姓怨声载道、民变四起。初露头角的马援心系天下、忧心黎民,在经过一番斟酌思索后,“择明主而佐”,毅然决然追随刘秀,以赤胆忠心、才智谋略支撑家国大义,为刘秀重新一统天下、开创“光武中兴”立下赫赫战功。

地皇四年(公元23年),新莽政权灭亡后,天下呈分裂割据状态,公孙述与刘秀各据一方、自立称帝,实力稍弱的隗嚣则盘踞陇右、自称西周大将军。此时,马援为隗嚣招募并深受器重。随着公孙述与刘秀先后称帝,处于弱势的隗嚣派马援探听虚实。马援亲眼所见公孙述“不吐哺走迎国士,与图成败,反修飾边幅,如偶人形”,而刘秀“经学博览,政事文辩,前世无比”。同时受到两帝垂青的马援,不受人情束缚,作出客观评价:公孙述乃“井底蛙耳,妄自尊大”,刘秀则“才明勇略,非人敌也”。时间识人,岁月识心。经过长期观察,马援决定辅佐刘秀,并诚心劝说隗嚣归顺明主。纵然后来隗嚣阳奉阴违、发兵拒汉,马援亦忠心耿耿、不改其志。

建武八年(公元32年),隗嚣听信奸佞挑拨起兵谋反,刘秀亲率大军讨伐。当部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,刘秀紧急召见马援,向其征询进兵意见。马援行军数载,惯擅兵法谋略、运筹帷幄,他跟刘秀详细分析当下形势,断言隗嚣的部队早有分崩离析之兆。又以米盘排兵布阵,以米粒堆成山川河海、高山沟壑、城镇都市,透彻分析战局,刘秀大赞:“房在吾目中矣。”“堆米成山”成为后世军用沙盘的鼻祖,既是军事史上的伟大发明,也是马援以智慧与赤诚辅保江山的生动见证。

谦逊有礼,躬体力行正家风

“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古时那些子孙多贤达、功业多卓著的名门,无不与其良好家风的传承息息相关。身居朝堂沙场,马援处处展现大义凛然、赤胆忠心;面对家人亲友,马援则身体力行、率先垂范,强调谦约节俭、廉公有威,不可轻薄无礼、失却分寸。

马援南伐交趾期间,听闻马严、马敦两侄儿喜与轻浮的侠客结交,并好讥笑他人之事、妄论他人长短。马援深感不安,亲自为侄儿寄去一纸家书,言辞恳切地劝诫他们慎交友、戒妄议,希望后辈多多结交像龙伯高一样敦厚谦逊、谨言慎行之人,不要行事作风流于轻浮、自大狂妄。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好议论人长短,妄是非正法,此吾所大恶也,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”字里行间,是为子孙长远计的远见,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教导。

《后汉书》记载,马援之女明德皇后温文尔雅、知书达理,对待君王不矜不伐、娓娓进谏,对待长辈孝顺恭敬、婉静有礼,被誉为“德冠后宫”之贤后。明德皇后之德性养成,离不开马援的谆谆教导与清正的家风熏陶。

忠勇无双,马革裹尸终还葬

马援功勋显赫却不贪图名利,终其

一生为国效力、尽忠职守,始终担忧自己德不配位、无功受禄。他在朝廷上不结党营私,在战场上身先士卒,以此报答国家的信任。

建武十一年(公元35年),马援官拜陇西太守,边塞战事频发,他带领部队勇猛奋战,即使被飞箭射穿小腿,仍坚持指挥将士横扫敌军。三

年后,马援从西南方打了胜仗回到京城洛阳,亲朋好友都高兴地向他表示祝贺。其中有个名叫孟冀的,以足智多谋闻名,是马援的老朋友。他对马援说道:将军啊,大丈夫沙场立功,此番得胜还朝,皇帝定有封赏,高官厚禄,封妻荫子……不料,未等孟冀说完,马援就皱着眉头对他说:我本指望先生能说些指教我的话,为什么先生也随波逐流,一味地夸奖我呢。见孟冀不语,马援说:男儿不应该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,然后被子孙用棺材敛尸埋葬。大丈夫战死沙场,用马的皮革裹着尸体回来埋葬,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!

建武二十四年(公元48年),南方武陵溪五溪蛮暴动,马援虽年过花甲,仍请战自荐:“臣尚能披甲上马。”刘秀见其豪气未减、壮心未已,由衷感叹:“矍铄哉是翁也!”平叛途中,马援已身染重病,仍忧心国事。每当听到敌人逼近、击鼓叫喊时,仍会拖着病体察看敌情。虽因决策失误而陷入险境,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不放弃希望,践行了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”的誓言。麾下将士无一不为“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的勇毅所动容。

马援荣耀一生,身后却遭奸佞陷害。原本为抵御暑热瘴气而从南方运



回的薏苡种子,被别有用心者污蔑为“明珠文犀”。马援终以莫须有的“明珠之谤”,名灭爵绝、凄凉下葬。正当亲朋故旧纷纷避之不及、生怕引火上身时,唯前云阳县令朱勃挺身而出上书鸣冤,诉说马援一生功绩及身后凄凉。“海内不知其过,众庶未闻其毁,卒遇三夫之言,横被诬罔之谗。”辞意哀切令刘秀动容,然空余惆怅。

马援为国效力数十年,西征塞外,北抵沙漠,南渡江海,在瘟疫瘴气中战死沙场,却落得一个褫夺封号、蒙冤待雪的悲凉下场。荣耀与悲哀相互交织,使其人生充满悲剧性色彩。历史长河奔流不息,千秋功罪后世评说。马援以“常恐不得死国事”的一腔孤勇、“穷当益坚,老当益壮”的青云之志,支撑起为家国安定冲锋陷阵、为苍生黎民出生入死的忠勇之躯。这份操守与坚贞,感动的不仅仅是朱勃,更是后世无数人。

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)

笃行君子

范永林

“民指田畴仓廪,过学宫而闻读诵声者,必重曰公;讼者望庭堂如目神明,必重曰公。公胡使人如是哉?夫民不难使之畏,惟爱者为难!”这是明代官员贾咏为许州(今河南许昌)知州邵宝所作的《许州知州邵公去思碑》,为官者能使百姓爱戴,是百姓之福,亦是为官者之福,邵宝就是这样一个贤吏。

邵宝(1460—1527),字国贤,江苏无锡人,《明史》中有传,放在“儒林”类目中。明成化二十年(1484),邵宝考中进士,历任许州知州、江西提学副使、户部四川员外郎、浙江按察使、南京礼部尚书等职。

邵宝三岁就失去了父亲,族人争夺家产,其母对金帛泉货一无所取,只取其父留下的千余卷书用来教诲邵宝。邵宝自幼天资聪慧,加之勤奋苦读,九岁便能作诗文。进士及第后,授许州知州。邵宝每到一处为官,都以百姓为念,重视教化,培养人才。

邵宝后来留下一首《忆母》诗,诗中

有几句,“手线缝衣欲问寒,慈颜时向梦中看”“读罢家音添鬓白,书成国事剩心

看到不少州县官吏玩忽职守,书院坍塌,教育荒废,他非常气愤,便行文饬令州县立即整修,并规划修复了白鹿书院学舍,新建一峰书院。

书院大兴于宋,元明逐步官学化,明代的书院更是与科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使得入读其中的学生,大多以取功名为主要目的,带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,从而将对学生的道德修养的培育挤到了次要位置。针对这一情况,邵宝提出:“道德至上,功名次之,富贵云者,当斤不与。”他还特地为白鹿书院写招生文谕,要求来白鹿书院求学的人暂辍求职,专心苦读。为了能更好选拔人才,每次乡试,他都要逐一阅看考生试卷。在《分司夜阅卷》一诗中,他这样描绘:“肯信行台是隐居,手寒中夜尚披书。冰霜气逼庭初静,星斗光临户正虚。”邵宝勤政之德可见一斑。

后来,邵宝回到故乡无锡,在惠山创建了二泉书院教授生徒,时人敬称他为“二泉先生”。他曾说:“吾愿为真士大夫,不愿为假道学。”他教育学生要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真正的士大夫,而不是言行不一的假道学。他对学生说,“古之道不能行于今,犹今之道不能行

于古”,希望学生不要一味死读书、读死书,应该结合当下的实际,有自己的思考。

为官数十载,除了重视教化外,邵宝一直坚持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,因为邵宝认为“何以守官?曰敬与廉。敬则不忽,廉乃有严。”他在江西任职期间,彭城有一粮长犯法,托人给邵宝送去千两金,遭到了严词拒绝,因此得了一个“千金不受先生”的称号。致仕后,无锡知县特地给他送来一顶坐轿,派来三名轿夫,他辞而不受,出门总是步行。嘉靖五年(1526)的一个深夜,邵宝府宅不慎发生火灾,房屋、衣物、藏书被烧一空,江苏巡按御史得知后,特地拨了一笔钱为他重建住宅,邵宝拒绝,就连亲友的帮助他也一律不收,时人对他的清廉自守无不赞美,称他为“笃行君子”。

世事沧桑,二泉书院屡建屡毁,所幸的是,今人不忘二泉先生,二泉书院也得到了修复并对观众开放。徜徉其中,仿佛能看到二泉先生濯缨自洁的身影,耳畔似乎仍能传来琅琅读书声。

(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,略有删节)